

# 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

## 宏观消费函数的演变

王美今 曾五一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消费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异常?它对深化改革的影响如何?本文通过研究改革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消费函数的结构性变化,对上述问题提出看法。

### 一、我国消费函数的结构性变化

消费函数是描述消费行为基本规律的工具。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宏观消费行为和城镇居民消费行为都可以用相对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来描述。相对收入假设的核心内容是:人们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当期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周围人们的消费行为以及消费者自身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利用时序数据建立的相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可以采用如下的形式:

$$C_t = \beta_1 Y_t + \beta_2 Y_t^* + u_t \quad (1)$$

或 
$$C_t = \beta_1 Y_t + \beta_2 C_t^* + u_t \quad (2)$$

这里  $C_t$  和  $Y_t$  分别表示  $t$  期的消费和收入;  $u_t$  表示扰动项;  $Y_t^*$  和  $C_t^*$  分别表示至  $t$  期止达到的最高收入和消费;参数  $\beta_1$  是边际消费倾向,  $\beta_2$  则是消费滞后比,体现  $Y_t^*$  或  $C_t^*$  相对于消费  $C_t$  的“制轮作用”。因为  $Y_t^*$  对  $C_t$  的影响实质上是通过  $Y_t^*$  所决定的消费水平产生的,因此式 (2) 对消费“制轮作用”的反映更直接;在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一般有  $C_{t-j} > C_{t-i} (i > j > 0)$ , 所以实际应用中大都采用式 (2) 的变形:

$$C_t = \beta_1 Y_t + \beta_2 C_{t-1} + u_t \quad (3)$$

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从改革前至改革后,模型 (3) 所描述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消费行为是否有显著的差异?以下我们利用经济计量学中同质性检验来解决这一问题。

改革前: 
$$C_{t1} = \beta_{11} Y_{t1} + \beta_{21} C_{t-1,1} + u_{t1} \quad (4)$$

改革后: 
$$C_{t2} = \beta_{12} Y_{t2} + \beta_{22} C_{t-1,2} + u_{t2} \quad (5)$$

对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消费函数的变化,可认为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消费函数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此时可认为模型 (4) 与模型 (5) 的参数完全相同,即  $\beta_{11} = \beta_{12}$ ,  $\beta_{21} = \beta_{22}$ 。

第二,消费函数部分发生质的变化。此时可认为模型 (4) 与 (5) 中参数部分相同,即  $\beta_{11} = \beta_{12}$ , 或  $\beta_{21} = \beta_{22}$ 。

1. 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即  $\beta_{11} = \beta_{12}$ 。

2. 消费滞后比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即  $\beta_{21} = \beta_{22}$ 。

我们采用《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历年消费基金和国民收入使用额代表消费函数中的消费和收入指标, 样本期为1953—1988年, 全部数据均按1952年可比价计算。测算结果见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边际消费倾向 $\beta_1$		$\beta_{11} = 0.090082(1.61309)$	$\beta_{12} = 0.446704(4.16108)$
消费滞后比 $\beta_2$		$\beta_{21} = 0.885032(9.09097)$	$\beta_{21} = 0.253842(0.203176)$
$\beta_1 / \beta_2$		(括号内为t统计量数值) 0.10178	1.75978
本期消费对收入的弹性系数	计算公式	$\frac{\partial C_{t1}}{\partial Y_{t1}} \cdot \frac{Y_{t1}}{C_{t1}} = \frac{\beta_{11} Y_{t1}}{\beta_{11} Y_{t1} + \beta_{21} C_{t-1,1}}$	$\frac{\partial C_{t2}}{\partial Y_{t2}} \cdot \frac{Y_{t2}}{C_{t2}} = \frac{\beta_{12} Y_{t2}}{\beta_{12} Y_{t2} + \beta_{22} C_{t-1,2}}$
	平均弹性	0.14731	0.76847
本期消费对上期消费的弹性系数	计算公式	$\frac{\partial C_{t1}}{\partial C_{t-1,1}} \cdot \frac{C_{t-1,1}}{C_{t1}} = \frac{\beta_{21} C_{t-1,1}}{\beta_{11} Y_{t1} + \beta_{21} C_{t-1,1}}$	$\frac{\partial C_{t2}}{\partial C_{t-1,2}} \cdot \frac{C_{t-1,2}}{C_{t2}} = \frac{\beta_{22} C_{t-1,2}}{\beta_{12} Y_{t2} + \beta_{22} C_{t-1,2}}$
	平均弹性	0.94343	0.23151

从表中可以看出: 改革前与改革后两个不同时期, 消费函数的各个参数都显著地不同, 我国的消费函数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改革后的边际消费倾向(0.446704)远远高于改革前的边际消费倾向(0.090082), 但消费滞后比却从0.885032下降到0.253842; 就参数的显著性来说, 改革前边际消费倾向的显著性不够高, 改革后消费滞后比则很不显著。边际消费倾向与消费滞后比的比值综合反映了本期收入和上一期消费水平对本期消费水平影响作用的大小, 因而也更综合地体现“制轮作用”的强度, 这一比值越低, “制轮作用”越强。因此, 从表中结果可以清楚看出我国宏观消费函数结构性变化的具体数量关系。

## 二、消费函数结构性变化的发生机制

相对收入假设认为, 消费的“制轮作用”的两种表现形式: 收入水平降低时, 人们会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以保持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平, 即通常所说的“消费不可逆”; 反之, 收入水平快速增长时, 由于人们还不习惯于较高水平的消费, 会出现相对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制轮作用”的第一种表现形式说明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基期, 具有明显的刚性特征; 第二种表现形式发生作用的程度, 则因人们对较高消费水平适应的快慢不同而明显不同。我国宏观消费函数的结构性变化体现了这一点。

改革以前, 我国消费基金分配和使用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 个人消费基金的分配实行半工资、半供给制。一方面, 居民收入长期维持一种超稳定的低水平结构。1952—1977年, 按可比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44.35%, 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只增长9.77%;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每年只增加1元钱。与这种收入分配相适应, 居民的消费方式是封闭的, 缺乏应有的消费决策权和自主权, 与市场的关系很不密切。具体地说, 城镇居民自行掌握的货币购买力只能用于解决饮食、衣着、日用品方面的消费需求, 由于其中许多主要消费品

实行票证制，这一部分购买力事实上也不能无约束地实现；而农民的全部消费中，非商品的自给性部分占三分之二左右。另一方面，居民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相当一部分消费是以社会、集体消费的方式进行的。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和就业直接联系，由国家“统”和“包”；农民则由生产队的公益金负担。

2.国家对消费基金的使用直接控制到微观领域。企事业单位作为消费者同样处于无权或权力很小的地位。不仅集体消费基金的总量和增量是国家掌握的控制量，而且这些基金的使用也在国家控制的范围内，“打醋的钱不能买酱油”，必须严格照章办事。

上述消费基金分配和使用的模式，使得国家能够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直接截取高积累，而对消费进行集权式的、突出国家利益的调节。其结果，是消费水平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增长；上一期所达到的消费水平，成了本期积累率上限的临界值。因此，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消费的常规增长表现为人均消费水平逐年缓慢的提高，其幅度保持在1元—6元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既是“消费不可逆”机制的要求，又是其作用结果。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消费品生产起步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行政性放权，很快形成收入分配主体多元化和分配形式多样化的格局。农民和城市非国有制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出现了许多高收入者；城镇职工的收入也因奖金、工资制度的改革而连年增长。在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同时，消费品分配和交换中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日趋扩大，居民的消费自主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证。这两个条件极大地激发了居民的消费热情，改革前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得到了补偿。这种明显具有“还帐”性质的改革背景，使得在消费性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进而使消费的“制轮作用”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失去了发生作用的基础。无可置疑，此时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包含有合理的成份，但收入攀比和消费示范产生的不良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消费主体利益格局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利益持平、竞优的心理诱发了收入攀比，人们对收入的期望值迅速提高，千方百计地寻求各种扩张收入的方法。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成为收入攀比实现的主要途径；工资侵蚀利润、企业消费与积累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半工资、半供给制的个人消费基金分配结构使得消费性收入还以福利分配领域的拓宽和财政支出的迅速扩张表现出来。据测算，近年来城镇居民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各种补贴和福利收入比例急剧上升，1978—1988年国家财政支出中，消费品价格补贴增加5倍多。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行致富者的高消费也产生了示范效应，它极大地强化了人们迅速提高消费水平的心理期望。而在消费方面起直接带头作用的社会集团消费，这些年来并不是崇尚俭朴节约，而是讲阔气比排场，1953—1977年，我国社会集团消费每年递增5.56%，1978—1987年则每年递增13.7%。集团消费的扩张已成为社会消费需求压而不缩的根源之一，它所创造的“示范效应”对社会消费意识的变化更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总而言之，改革以后，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攀比消费性收入——扩张消费性收入——追逐当前消费的现象，因而使消费性收入扶摇直上，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上一期消费水平的影响作用显得疲软无力。

### 三、消费函数结构性变化的启示

消费函数结构性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

第一，控制总需求膨胀的途径应从单纯地压缩投资控制积累向既控制投资又控制消费转化。改革以前，为了控制总需求膨胀，压缩基建项目的紧缩政策曾多次启用，一般都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当时总的说来是生产背离消费，总需求膨胀的枢纽点是投资需求。目前的总需求膨胀则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重膨胀。虽然从理论上说，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能使消费增长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效应增大，但在资源短线的约束下，双重膨胀并发的总需求未能拉动总供给，只会使国民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类似改革前的紧缩政策，仅仅压缩投资需求而不同时压缩消费需求，固然也能使过热的经济降温，但势必限制积累的常规增长，恶化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削弱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后劲。

第二，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控制方法应从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化。消费者的利益刚性，也即“消费不可逆”是控制需求时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使在改革前，消费者利益刚性也有顽强的表现：在某些经济发展不正常的年份，国民收入的增量为负值，消费的增量仍为正值；这表明该时期国民收入大起大落的波动主要由积累的波动来承担，消费者利益刚性在很大程度上熨平了消费本身的波动。在目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消费者利益刚性必然表现为社会各阶层对通货膨胀带来的实际收入损失进行补偿的压力加大。它一方面引发企业对产品“水涨船高”地涨价，另一方面迫使财政负担巨额的价格补贴，从而使“成本推进”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难以遏制。如果政府采取某些强硬措施直接降低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却未必能达到促进总供需平衡的目的。因为一段时期内，消费者可能通过减少银行储蓄来维持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而当实际收入的下降突破消费者所能承受的程度时，则可能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制约供给的增长，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由此可见，消费者利益刚性直接降低了政府控制消费需求的自由度，对消费需求的控制应当充分重视间接控制手段的应用。下面简述两点。

1.控制居民消费需求的起始点是创造理性的“消费示范”。非理性的攀比和示范效应对消费需求膨胀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控制消费需求的膨胀也应当从理性的“消费示范”做起。这不仅包括宣传媒介为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所作的呐喊，而且包括具体、切实的示范引导。首先应从制度上约束社会集团消费行为。集团消费行为对社会消费意识的影响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目前对社会集团消费的强行紧缩是必要的，从长远看还应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方法，防止集团消费出现奢华、铺张的倾向，杜绝从集团消费中尽量捞取个人消费品的现象。其次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消费观念，鼓励合理消费。宣传媒介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宣传不能只渲染吃、穿、用的变化，而且要注意介绍科学的消费知识、规范和经验，帮助人们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值，培养消费者把握消费的自主意识以及合理进行消费决策的能力。这些措施对减少消费的随意性和盲目模仿性，防范外国消费文化的冲击，弱化重名不重实的消费荣誉感对消费行为的刺激，极有好处。另外，还应当看到，解决体脑收入倒挂问题，改变收入——消费水平与科学文化水平背离的状况，形成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的消费示范层，这对端正社会在消费问题上的主导意识也极有好处。

2.控制居民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是把消费性收入引导到利用于积累的方面。不少国家

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个人储蓄可以成为积累的重要来源。例如在1972年至1976年间,日本、美国等19个国家居民储蓄占整个国民经济净积累的比重平均高达59.83%。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个人收入水平日益提高,如何将个人的消费性收入引导到积累方面来,已经成为一项需要妥善解决的重要课题。以长期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构成的前瞻性消费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决策要考虑一生的整个生活过程,其现期储蓄是对一生收入及消费作出合理安排的结果。这些年我国城乡居民现期储蓄存款中,保证退休后生活需要的后备性存款占1/3左右,而城市居民为“退休后生活有保障”而储蓄的仅占8.9%。按前一比例推算,1987年后备性储蓄存款约689.2亿元,该年老年人口(女55岁以上,男60岁以上)每人平均672元,大约只是一年的生活费,而该年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大约还有15年。这种情况说明,个人收入增长并未伴有对未来消费风险预期的增加,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目前仍然是为了短期或中期消费。因此,社会福利与保障体制的改革必须与收入分配政策的改革同步推进,以增加居民对未来消费的风险预期,提高其“后备性需要”的储蓄需求。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使居民存款的利率,略高于或至少不低于同期物价的上升率,从而鼓励居民储蓄。与此同时,还要善于利用居民的储蓄需求,拓宽个人投资渠道,如开展长期投资债券业务,运用贷款方式进行生产建设投资,将消费性收入转化成积累基金。

### 参 考 文 献

- [1] (美) 邹至庄著, 郑宗成等译, 《经济计量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8 年出版。
- [2] 黄运城, 《宏观消费行为的统计分析》, 《预测》1987 年第 2 期, 乌家培、张守一主编《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第四章。
- [3] 袁培树、陈昕, 《消费经济学批判》, 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
- [4] 杨圣明, 《我国消费体制改革探讨》, 《经济研究》1985 年第 3 期。
- [5] 王志华, 《我国近十年居民收入增长与结构变动》, 《经济研究》1989 年第 5 期。
- [6] 张振斌, 《中国通货膨胀的财政分析》, 《经济研究》1989 年第 5 期。
- [7] (日) 南亮进, 《日本の经济发展》,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81 年版。
- [8] 胡逢吉, 《关于消费量变化的规律性》, 《财贸经济》1986 年第 1 期。
- [9] 社科院经济所居民行为课题组, 《居民的消费选择与国民经济成长》, 《经济研究》1988 年第 1 期。

1989 年 10 月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